

清晨睁开眼,我们就开始听到各种声音:鸟鸣、风声、雨声、水流声……再后来,是厨房的抽油烟机、光波炉、破壁机的轰鸣声……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与各种声音打交道,它们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当然,除了那些常用的家用电器,还有更多的机器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上演着奏鸣曲——液压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声、涡轮机连续且均匀的嗡嗡声、冲床短促而有力的敲击声、剪草机连续的咔嚓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的工业背景音。

曾几何时,机器不过是冷硬的钢铁与精密的齿轮堆砌而成的工具,它们默默地在工厂车间里旋转,在农田上耕耘,似乎与人的生活世界保持着一段难以逾越的距离。

茅奖、鲁奖获得者,知名作家刘醒龙的散文新作题为《又忘了一个词》,忘了什么词,文中似乎没提及,却深情而深刻地探讨了机器与人类文明的交织,以及时代变迁中机器命运的沉浮。他赋予机器以情感与使命,展现了机器作为历史见证者的不朽价值。

作为人类智慧的延伸,机器从简单的工具到复杂的计算机系统,它们不断拓宽着我们的能力边界。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正逐步迈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时代——一个机器不仅会计算、执行,甚至开始“说话”,与我们进行情感交流的时代。

(周璐)

文艺评论

诗人对家园赤子情深的凝望

——读阿毛诗集《公园记》有感

□夜鱼

读毕阿毛新诗集《公园记》,合上书,我意犹未尽,惊叹又欢喜。惊叹英雄城市武汉,居然有如此众多人文荟萃景色斑斓美丽的公园!更惊叹诗人阿毛涉足每一座公园的勃发兴致与深情厚爱。

湖北号称千湖之省,省会城市武汉,城区和郊区,大大小小的湖多到数不胜数。围绕着湖水会形成一些相应的公园。我在武汉生活了半辈子,除了大名鼎鼎地标性的大公园之外,《公园记》里所记载的公园,百分之八十没去过,有些甚至少有所闻。

欢喜则来自《公园记》符合我对诗歌的期待,厚达350页的诗集,阅读感受相当愉悦。这可不是公园景点介绍的百度分行体,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带着诗人的体温与情感,如数家珍。

阿毛诗艺娴熟,表达方式多样,这里我选取其中的三种写作特色做点简要介绍。

首先,擅长在客观呈现里进行不动声色的诗性表达。诗歌《和母亲逛堤角公园》,分别从公园的安静、热闹、醒目等几种状态下,截取了堤角公园的一些日常景象,诗人当然是在场的,更重要的是诗人母亲的在场,语言简练质朴,即便是小到颜色的对比也围绕在母亲身上:

菊花桃的玫红与我母亲银发的对比/倒映在水帘洞的河面上

生动的细节之美,回到事物本身的客观性呈现里,徐徐展开了一幅爱与怀念的温馨画卷。这类风格的诗歌还有很多,比如《王家墩公园》《青年节在中山公园读诗》《紫阳公园记》等等。在场的鲜活体验,使得阿毛笔下的公园无论是人还是自然风景,都与内心情感世界相投射,妙笔生辉,巧妙糅合,诗性饱满丰厚。

其次,针对不同公园的人文特点,多角度切入,高度凝练又别具一格的诗性表达。

《龙雅阁》里航拍般的视角,将地理风貌立体全面地呈现出来,寥寥数笔,却气象恢宏。“最美的母衣模板/还是这龙王庙俯瞰下/浩浩汤汤漂流着的/青灰对襟衣”,诗人在俯瞰视角下,运用的比喻,直观形象,精准贴切。由此我们不难感受到诗人对家园山水的自豪和热爱。

而在另外一首《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诗人则放出了高处远处全貌概览式描述,一步步踏入了现场,也一步步走进历史的深处,选取了既有历史感的物象,又有现代感的物象,提炼出的形而上思考,意味隽永深厚。

“……在铁铲开始的寻根/使幽暗从裂缝透出来/个人史依附于城市的演变

史”

与人文景色不同,《诗画渡渡湖》则是纯粹的自然风光。如何用短短的十几行句子写出渡渡湖瑰丽的景色及其丰富的变化呢?多才多艺的阿毛既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优秀的画家,这首诗她又换了一种进入角度,拿出了她的绘画功夫,先迅速勾勒出水彩、落叶、飞鸟、野玫瑰,也没忘了漏绘富有动态感的细节:空中的弧线、水中的涟漪、云中的英姿。在诗歌结尾,她直接运用绘画者的语言做总结:先是迥异的速写素描/最后是不约而同的——/巨大而有力的惊叹/与突兀而完美的色块。

最容易同质化的自然风光描绘,在阿毛简洁利落的笔下,呈现出辨识度极高的语言质感。像这类诗歌还有《兰亭公园的碎花长卷》《江夏中央大公园》《春天的小兰湾》等。诗人总能在大同小异的自然风光里,敏锐地发现不同之处,撷取精妙,书写烂漫。

再者,灵动诙谐,直戳当下症结的诗性挖掘。

这类诗歌的表达,也让人叹为观止。在《于晴川阁眺望黄鹤楼》中,诗人这样写:……咀嚼塑料花的/牙齿咬不开自然派的坚果。

全诗开头略显低沉的语调,接着运用强烈反差的意见,将现代人的茫然,开诚布公地揭示出来。接着诗人笔锋一转,谈谐反讽,劝告在旧码头碑下拍抖音的中年:/取来新船上的救生圈/套在发福的腰间/删剪走秀的人群和道具/自然秉持的三段论而非三点式。

读者忍俊不禁之时不由得也跟着诗人一起思考、慨叹!像这类诗还有《纱帽公园》《山水公园》《落雁岛》《洋桥公园》等。诗人对家园的赞美毋庸置疑,纯粹真挚,但她的诗却没有仅仅停留在赞美层面上,同时也敏锐捕捉到当下文化在文明进程中的矛盾之处。

阿毛的《公园记》所录景观,横跨武汉三镇,洋洋洒洒,包罗万象,远不止我上面所说的几种风格特点的表达。主题多元、立体,给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绘制了一卷现代性与古典美相辉映的诗歌画册,繁复与清隽,简笔与伏笔,浓墨淡彩,诗人悬腕自如,不仅对武汉三镇的城市公园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全景式展现,同时也有鞭辟入里抽丝剥茧的透析,是诗人对家园赤子情深的凝望和身心沉浸式的抒写。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长江丛刊杂志社诗歌栏目编辑)

以草木为棱镜

——读老藤《草木志》有感

□安建梅

作为辽宁作家老藤的忠实粉丝,知其极擅长对白山黑水地域文化的多面书写。他的小说所涉领域宽广、笔力深厚、意蕴绵长,文学性思想性专业性极强。印象最深的是老藤十分钟情于对动物的描写,他笔下的动物世界可谓活灵活现、情趣十足、形神兼具。在他新近出版的长篇新作《草木志》中,老藤出人意料地把笔锋对准了植物界,以植物为纲目完成整部文学作品的写作,不仅实现了他文学创作上的自我突破,也为他的“北地”文学版图延伸出新维度。

《草木志》以生物专业毕业研究生、现任省直机关干部的“我”挂职驻村第一书记为起笔,生动讲述了东北边陲驿路古村落“墟里”,从即将被撤的落后村,快速成长为特色文旅引领下生态优美、邻里和谐新乡村的振兴故事。以草木为棱镜,透视乡间人与事,是作品最为惊艳之处。作者一方面以生长在墟里的打碗花、拉拉秧、红菇蕨、杨铁叶子、老地榆、一把抓等植物为名,搭建起29个章节的框架结构;另一方面又通过植物读人阅事,为每一种植物关联起一位脾性相似的关键人物形象,推动故事向纵深发展,为小说状物喻人叙事提供了清晰的逻辑架构。这样的谋篇布局可谓一举两得,既直观呈现了墟里村“北地百草园”的生态小环境,完成了“草木志”在生物领域的专业写作;又以草木喻人,聚焦如草木般植根于乡间大地的诸多普通民众形象,为乡村振兴书写立体饱满、朴实智慧的人物志英雄谱。

在小说故事情节的铺陈上,老藤借助于“我”和上级领导老雷关于“有形之事”与“无形之事”的多次探讨,对应乡村振兴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两条主线起承转合、徐徐展开。第一条主线通过“我”、村主任邵震天、青年企业家寒寒等人建设望乡厅、开发“驿路·遇见”文旅项目、修复小龙庙、申请红松天然林自然保护区等有形

之事,为古驿路文化赋新能,搭建起墟里村通往富裕之路的经济支撑和项目依托;另一条主线以方、石两姓家族的三代恩怨为线索,从追踪伤人蛇祸、殉情横祸、养殖灾祸背后的真实原因入手,通过乡村治理化解一系列邻里矛盾等无形之事,连接起村民同向发力的“同心桥”,为墟里村振兴之路注入更为持久的情感认同、思想认同。这样的故事结构,使得小说不仅以引人入胜的叙事见长,更因深刻的思想性、哲学性而耐人寻味,小说的社会价值、时代价值也更为深远。

以山林之草木写乡村之故事,为小说平添了倍感亲切的乡土气息。小说中老藤对乡村生活进行了深度挖掘与还原,无论是讲段子、说歇后语等语言表达,还是嗑毛嗑、吃杀猪菜、喝小烧等生活场景,抑或鼓乐队、吹喇叭、二人转等乡间文化,都取材于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质朴的乡风乡情扑面而来。小说立足于乡民视角,以幽默讽刺的笔法,在多个章节批评反思了乡村振兴中生搬硬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做法,从中窥探出老藤不仅在进行文学创作,更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为乡村振兴探索一条可供参照,可以复制的振兴样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老藤通过作品《草木志》,在墟里村的振兴图景中深情描画了他心目中的“金山银山”,展现出他对白山黑水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书中的引子部分他所提及的“炊烟袅袅”的人间烟火情里,洋溢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气息,使得乡村振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画卷跃然纸上。

(作者系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大连市西岗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王蒙王学典对谈录》简评

□张道奎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当下最大的政治。中华文明在“轴心突破”期所创造的思想结晶集中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独特的中华人文智慧。为积极响应中国式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等重大时代课题,“人民艺术家”王蒙与著名历史学家王学典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对话。作为对话成果集中呈现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对谈录》围绕“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对待现代”等问题,深入探讨了我们当下应该如何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尝试以对话的独特方式碰撞思维火花、凝聚基本共识、探索未来道路,因而体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对谈”呈现了两位文化大家基于切身阅历与经验的深刻思考。王蒙不仅是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是“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也始终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者、参与者与推动者。王蒙的诸多小说作品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等曾在发表后引发轰动效应,多篇文学评论作品如《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人文精神问题偶感》等推动了学界的诸多大讨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文化走向问题、文化改革发展问题都具有切身体会。“王蒙王学典对谈”活动,即是王蒙基于对中国当下文化问题、理论问题的深刻把握而率先倡议的。王学典是著名历史学家,是人文学术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并追踪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观点、新主张、新思潮,对近四十年的文化走向、学术走向、理论走向具有深刻理解和独到判断,近年来更陆续提出“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等重要学术观点。因此,对谈双方都是学术大家,都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文化的重大变迁和文化自信觉醒的过程,是近四十年来文化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这种名家对谈的形式,应该说是目前探讨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一种崭新创举。

二是“对谈”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应该如何对待传统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更加被赋予了新的期待,承担了新的文化使命,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亟须深入探讨的重大命题。为更好地回答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使命问题,王蒙在此次对谈活动发起之前就曾反复思考“传统文化的特色与生命力”““儒学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与文艺复兴”等问题,此次对谈即是王蒙上述思考的系统性呈现。王学典近年来深入思考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对传统文化及儒学发展大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热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与特征等问题都发表了独到且深刻的见解。在上述思考的基础上,《对谈录》首先回答了“人类现代文明建设为什么而且必然能够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展开”的重要问题,这是我们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回答的问题。其次探讨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路径问题,一致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来开辟实践道路,要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

文艺创作离不开人民和大地

□周思明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习近平总书记还引用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有关创作导向的话语,并结合自己对文艺创作的理性认知,言简意赅地回答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什么和如何为的问题,进而为新时代中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体现在蕴含民众利益及情感诉求的丰富多样历史与现实内容上。中国文艺源远流长、绚丽多彩,来自人民也服务人民。文艺创作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文艺生生不息、繁荣进步的关键因素和根本动因。在中国古代社会,普通劳动人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能用书面形式进行创作,因而文艺创作是靠民间口头传授方式得以赓续。但无论文艺创作采取何种方式,都离不开人民生活的广袤大地。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大力突出人民性,是我国文艺事业的生命之根和生存之本,正如鱼之于水、鸟之于林,不可须臾离分。回顾中国文艺发展史,无论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还是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孟姜女变文》,以及反映时事的《张议潮变文》等,都在揭露社会腐朽落后现象的同时,倾力讴歌勤劳智慧的人民大众。其中,宋、金时期的代表作品《碾玉观音》《错斩崔宁》《杨温拦路虎传》《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元、明时期的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和情感诉求。文学名著《红楼梦》《聊斋志异》的出现,为中华文学贡献了更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其内容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蕴含着鲜明强烈的人民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体现在现代民间艺人和文艺家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多种类创作成果上。如中篇说唱鼓词《二全锁》《对花枪》等,短篇鼓曲

作品《红月娥做梦》《借》《偷石榴》《闹天宫》《打黄狼》等,都具有清新朴实的民间艺人风格,且传唱一时。现代文艺作品有鼓词《大功国民》《早婚害》,单弦《秋瑾就义》等。1927年以后,革命家、理论家、作家瞿秋白不仅在文艺理论上独有建树,还亲自参与修改了鼓词《王大嫂》;女战士李素娇编唱的五句落板《白军士兵出路歌》和很多歌颂土地革命、歌颂红军的小唱,起到了很大的革命鼓舞作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作家赵树理、王亚平,战士毕革飞,民间艺人王尊三、韩起祥、沈冠英等人创作的文艺作品,如《晋察冀小姑娘》《刘巧团圆》《考神婆》《大生产》《王丕勤走南路》等,均很好地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具有突出的人民性。而在国统区,一些进步作家也积极创作带有人民性的文艺作品,如老舍的鼓词《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新女性》等,而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萧红、张爱玲、丁玲、周立波、孙犁等作家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创作的作品,如《呐喊》《彷徨》《女神》《子夜》《林家铺子》《家》《春》《秋》《四世同堂》《雷雨》《原野》《日出》《边城》《长河》《生死场》《呼兰河传》《金锁记》《小团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白洋淀纪事》《荷花淀》等,更体现了文艺创作源自人民、反哺人民的特征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还体现在当代文艺家深入人民群众之中,不断为人民输送具有人民性的文艺精品文化自觉上。文学创作方面,有《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创业史》《艳阳天》《平凡的世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白鹿原》《鸡窝洼人家》《高山下的花环》《红高粱家族》《命若琴弦》《我与地坛》《乔厂长上任记》《大墙下的白玉兰》《夜的眼》《尘埃落定》《人世间》等。电影电视

结合来开辟理论道路。最后,进一步讨论了如何通过传统文化的社会科学化和伦理型生活方式塑造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通过深刻理解西方现代化本质和把握赓续传统的“中国式”特点来完成中国式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在上述逐层深入的论证过程中,核心论点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三是“对谈”兼具通俗性与深刻性、发散性与系统性、文学性与思想性。首先,《对谈录》是在对话的形式下进行的,其中有许多口语化的表达。为了维持对话色彩与话头机锋的原貌,未作过多修饰,因而具有口语化与通俗性特点。同时,又因许多话题是两位先生数十年人生经历经验和文化建设思考的集中表达,对某些关键问题如现代化的必要性、文明对话的优势等问题的讨论,往往三言两语就直指要害,同时还披露了两位先生经历的某些少为人知的故事与缘由。因而对谈在文字表达上具有口语化与通俗性,在所谈论的问题本身及相关认识上具有深刻性。其次,本书的文字来源既有文字笔谈,也有现场对谈,因而在讨论中时常随话题而迁延。“如兴之所至时的随意性,谈论甲问题时岔到乙问题上且有时忘记返回的发散性、跳跃性等”“有写小说的习惯,喜欢放射性结构思维”等,这正是思维活跃的表现,因而在具体话题上呈现出分散性。同时,本书在集中编辑整理时已考虑到对谈中各话题的逻辑关系问题。因而在尊重两位对谈者原意和基本风格的前提下,对本书呈现的三大部分内容及其章节顺序按照论述逻辑作了调整,在现场对谈中也就前期末曾展开的问题如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等作了深入讨论。因而对谈在具体话题上呈现分散性,在总体上仍不失系统性。最后,对谈是在作家和历史学家之间进行的,兼具文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思维特征。王蒙直言对谈是“小说家言与历史学者言论切磋应和”,因而文学家具体而感性的理解与历史学家对规律性的追问在对谈中都有鲜明表现。对谈中既有小说家、文学家特有的实例描述与感性认识,如王蒙对《红楼梦》的隐喻理解、对《庄子》的知识产权举例、对新疆快速发展的赞叹、对古典诗词名句的引用等等,都大大增加了《对谈录》的生动性与可读性;同时对谈中也有基于历史学思维的思想性探索与层层推进的理论论述,不断推动话题走向深入,如对中国国情三大特征的概括、对中华文明发展前途的论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路径的新探索、对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同时区别于中国传统道路的追问等等,都具有显著的创新性与深刻的思想性。文学家与历史学家对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的不同角度的解读与回答,在此次对谈中不仅融为一体,更相得益彰。

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良性互动、完美融合,其最深厚而活跃的根本就是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就是生活,就是人民”“特色在于实践性”,这是两位先生在对谈中的重要共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由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必将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特约整理者)

剧有《伤逝》《阿Q正传》《子夜》《林家铺子》《家》《四世同堂》《原野》《边城》《刘三姐》《青山恋》《青春之歌》《战火中的青春》《李双双》《英雄儿女》《创业》《闪闪的红星》《洪湖赤卫队》《五朵金花》《芙蓉镇》《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喜盈门》《难忘的战斗》《人到中年》《小花》《鸦片战争》《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大决战》《凤凰琴》《生死抉择》《惊涛骇浪》《觉醒年代》《潜伏》《智取威虎山》《沸腾的群山》《父母爱情》《大山的女儿》《狂飙》……这些文艺精品,或凄美悲壮,或曲折婉婉,或慷慨激昂,或粗犷张扬,或柔情似水,或意味深长。它们千姿百态,各美其美,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对艺术追求的精益求精,对人性刻画得鞭辟入里,对世相描绘的生动传神,进而凸显出对生命的尊重,对精神的追索,对灵魂的展示,对人民性的重视。

一部中国现代文艺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国百年思想史。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则是贯穿文艺创作始终的生命线,是中国式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生命之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自觉突出文艺创作的人民性,不是躲避崇高、犬儒失范的率意而为,也不是苟苟蝇营、苟且偷生的小市民生存相之呈现,不是“一地鸡毛”式世俗生活逻辑遵循。当我们在谈论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时候,要警惕和抵制在理论范畴内的作秀,在实践范畴内的内卷,要对文艺创作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切实有力的动能支持。置身新时代,文艺家要少点功利心,多点事业心,埋头苦学,祛除浮躁;要在“有限”中写出“无限”,在“限制”中凸显“酣畅”,努力创作更多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具有较大思想深度、复杂多样的历史和现实内容及丰富生动故事情节的精品力作,努力推动中国文艺事业从高原迈向高峰。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文学评委会委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